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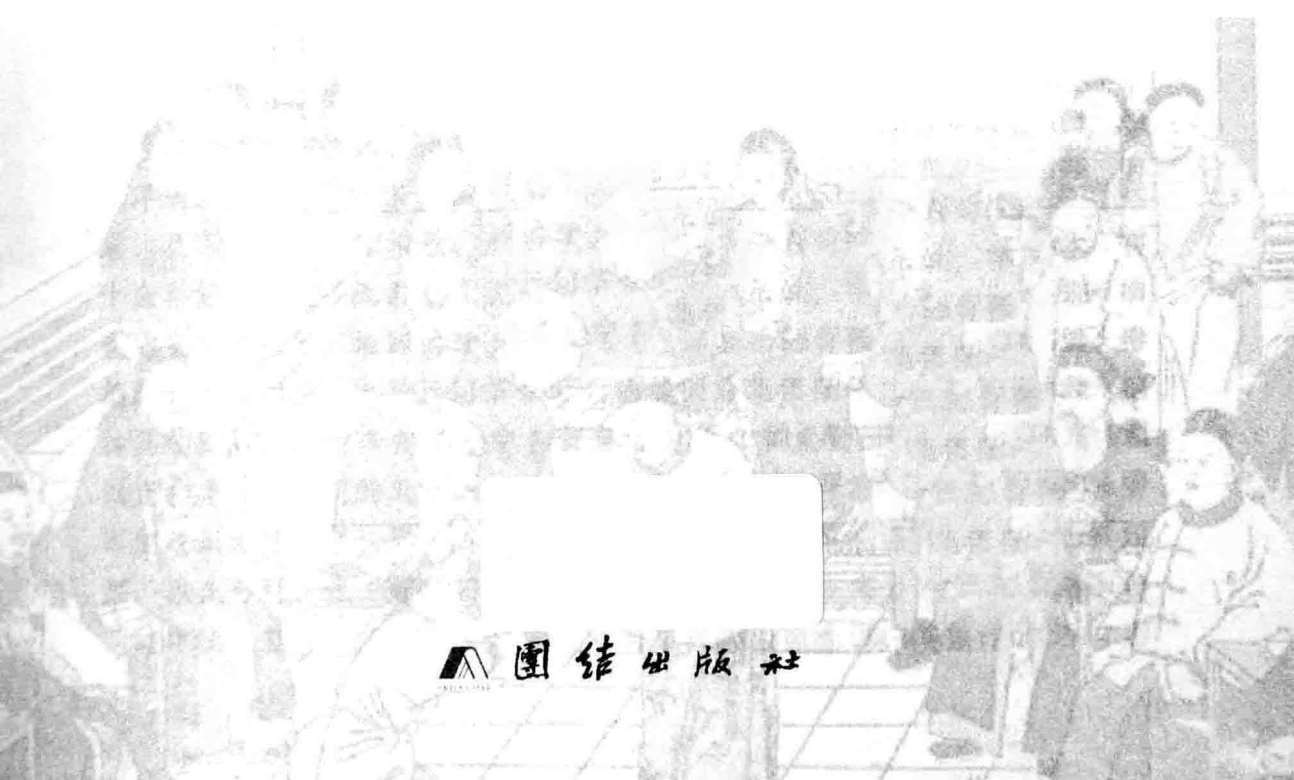
朱东安 著

曾国藩集团 与晚清政局

曾国藩集团这个近代史上最大的地方实力派，不仅数十年间暗中操纵着晚清政局，且开民国年间军阀政治之先河，其政治作用与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这样的历史格局是如何形成的，又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怎样深远的影响？



曾国藩集团 与晚清政局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 / 朱东安著.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5126-1465-9

I. ①曾… II. ①朱… III. ①曾国藩 (1811~1872) — 人物研究 IV. ①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3604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010) 65238766 85113874 65133603 (发行部)

(010) 65133603 (邮购)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出版社)

fx65133603@163.com (发行部邮购)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70X240 毫米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412千字

印 数: 5000

版 次: 2013年3月 第1版

印 次: 2013年3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5126-1465-9/K·816

定 价: 39.00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前 言

古人云：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水可载舟，亦可覆舟。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外不能御侮，内不能安民，广大民众不得不揭竿而起，寻求新的出路，以拯救民族的危亡。其战争的正义性是不言而喻的。

然满洲贵族虽曾以武力征服了中原，而后世子孙的腐败，却令其不得不依靠湘淮练勇来镇压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遂致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分权增强，兵为将有，权出私门，国家军政实权落到地方督抚手中，晚清政局为之一变。其实力最强的曾国藩集团，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国家命脉，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态益趋严重。曾国藩充任首领时，虽有功高震主之嫌，也不过握有东南地区及直隶等省的地方大权。而李鸿章接掌门户后，则又进而控制了中央政府的国防、外交实权，或战或和皆其一身承办，遂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签约专业户。及至八国联军侵入中国，清政府对外宣战，他们竟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公开分裂，同侵略者搞起“东南互保”。其势焰之盛，概可想见。只是由于清朝统治阶级上层的满汉联盟尚可维持，方使君臣双方各安其位。

甲午战后清政府编练新军，本欲从汉员手中收回久违的兵权。而出于政治腐败这同一原因，使其事与愿违，陷入更深的政治危机。趁机而起的北洋集团，不仅与湘淮集团有着政治、经济、思想、组织等千丝万缕的联系，且军营风气一脉相承。加以帝国主义侵华势力的利益纷争，遂将民初十余年间，弄成既无君权又无民权的时代。如果说，曾国藩集团既保住清朝的皇位又挖掉其墙脚的话，而袁世凯北洋集团的背叛，则直接导致了清朝的灭亡；如果说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的曾国藩集团既保住清朝的皇位又挖掉其墙脚的话，而辛亥革命中各省督抚的独立和袁世凯北洋集团的背叛，则直接导致了清朝的灭亡。如果说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成功，只是曾国藩军制改革之花的话，那么清朝的灭亡和随之而来的军阀混战才是其累累硕果。由此可见，曾国藩集团这个近代史上最大的地方实力派，不仅数十年间暗中操纵着晚清政局，且开民国年间军阀政治之先河，其政治作用与影

响是不可低估的。

然而，他们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起家，又力主维护传统文化和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中体西用，师夷制民，遂成为争议最大的一群历史人物。有人颂之为中国现代化的先驱，后世仿效的楷模；有人则斥之为遗羞百年的政治僵尸。真可谓见仁见智，竞奇斗艳。而要弄清其中的原委，予以恰当的历史评价，则不能不对之进行认真深入的研究。然而多年以来，有关曾国藩集团的研究，虽多方重视，成果可观，但仍处于孤立、分散的状态。或限于某一人物，或限于某一侧面，很少有人对之进行整体考察，更很少有人将这个集团同太平天国、清朝政府以及北洋集团联系起来加以研究。而其得出的结论，则又往往政治色彩较浓，学术色彩稍淡。

笔者的研究则欲将曾国藩集团视为一个整体，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尽力探索其由内及外的种种联系，并将之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进行观察，以求取得较为全面、客观的效果。唯水平所限，时不我待，虽苦熬六载，初有心得，却难免舛误疏漏之处，诚请读者多多校正。尤其抛砖引玉，精品迭出，对这群历史人物的出现与消失，能够做出较为科学的解释，从而走出近代史研究中相沿已久的非白即黑、不骂就捧的怪圈。

目 录

第一章 风云际会	(1)
第一节 太平天国革命的爆发及其对清政府的沉重打击	(1)
第二节 中央政权权力结构的变化与归复：相权的让出与收回	(7)
第三节 清政府政治对策的形成与实施	(17)
第四节 内轻外重的形成与清政府的对策	(38)
第二章 易装自救	(52)
第一节 主要成员	(52)
第二节 思想与政治基础	(82)
第三章 纠结成团	(111)
第一节 集结始末	(112)
第二节 内部派系	(149)
第四章 致胜有术	(176)
第一节 军事可恃	(177)
第二节 筹饷有方	(190)
第三节 知人善用	(210)
第五章 坐断东南	(239)
第一节 恪守臣道	(240)
第二节 坐断东南	(259)
第六章 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271)
第一节 中体西用 师夷制民	(271)
第二节 近代军阀的鼻祖	(289)
第三节 地主买办阶级的精神偶像	(298)
附录一 主要成员简历	(302)
二画 丁	(302)
三画 万卫	(303)
四画 方毛王韦邓	(304)

五画	冯厉史叶左帅甘田	(306)
六画	任刘华吕多孙庄成朱江汤许	(308)
七画	严何余吴宋张李杨沈苏	(315)
八画	邹陈周屈庞易林欧阳罗范金	(325)
九画	娄恽段洪胡赵钟饶骆倪	(332)
十画	唐夏容席徐栗桂涂聂莫钱陶郭高勒	(334)
十一画	康曹梅萧阎隋黄	(340)
十二画	塔彭普曾游裕程董蒋	(343)
十三画	蒯褚雷鲍	(347)
十四画	翟谭	(348)
十五画	潘黎	(348)
十六画	薛	(349)
十七画	魏	(350)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351)

第一章 风云际会

清王朝是中央集权和极端君主专制的一代封建政权。然而自从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以来，随着内战的推进，其权力结构自中央以至于地方都发生很大变化，突出表现在相权的析出和督抚权力的膨胀。总之是皇帝大权旁落，一分于宰相，二落于督抚，中央则肃顺、奕訢先后秉政，地方则形成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一大批掌握军政实权的汉员督抚。前一问题已由那拉氏于同治四年加以解决，而督抚专政问题则成为尾大不掉之势，终有清一代未能改变，且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对于这一历史现象，有的方面，如地方分权的增强和中央集权的削弱，史学界已达成共识；而有的方面，如肃顺、奕訢秉政，则有不同的解释。至于上述种种历史成因，就更是人言人殊。本章拟就清朝咸同年间权力格局的变化及其历史成因，做一较为系统、深入的探讨，以期揭示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辩证关系，从而展开曾国藩集团崛起田间的时代背景，亦为本书的研究主题揭开序幕。

第一节 太平天国革命的爆发及其对清政府的沉重打击

中国地主封建制社会经过长期的发展和多次的王朝更替，到了明代，已进入晚期阶段。其标志就是，经济领域中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和政治上封建君主专制的进一步加强。而清王朝的建立则使日渐衰微的封建制度回光返照，再度辉煌。由于满族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封建社会，世风古朴，新兴贵族没有明朝统治者那样的腐败积习，又接受了明朝灭亡的教训，故在国家的治理上兢兢业业，颇有政绩。尤其是在位多达六十年之久的康熙、乾隆两帝，比之唐宗、汉武并不少让。在他们的治理下，清王朝兴旺发达，出现了一百多年的太平盛世。

由于满洲贵族初入中原，腐败风气习染未深，加以接受明王朝因加派“三饷”导致迅速灭亡的教训，生活上非常注意节俭，力图减省宫中开支。据载，自入关以来至康熙十九年，清朝“外廷军国之费，与明代略相仿佛。至宫中服用，则以各宫计之，尚不及妃嫔一宫之数。”^①与宫中修造、花用

^① 王庆云：《石渠余纪》，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卷，第1页。

相关的工部、光禄寺每年支用银两，亦“较前朝省十之九”^①。故财政费用年有盈余，及至康熙末年，户部库银已有“五千余万之积”^②。

然而，乾隆朝以来，宫廷费用与军政开支渐增，吏治渐坏，贪污大案迭起。文武官员养廉费的增设，不仅没有使他们较前更加廉洁，反而使他们贪欲日增，腐败日甚。绿营兵增额六万，年耗库银三百万两，其战斗力反而日益降低。迨至乾隆中期已开始出现衰落迹象，只是各种社会矛盾统统掩盖在“太平盛世”的外衣之下，尚不为世人所警觉。而乾隆帝晚年耽于游乐和奸相和珅的秉政，政以贿成，人以干进，“风气为之一变”^③，则加速了这一衰落的进程。而嘉庆元年爆发的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更使清王朝由鼎盛走向全面的衰落，兵无斗志，库无帑银，沿着下坡路一步步走下去。

正当清王朝一衰不振的时候，野心勃勃的西方殖民主义者打了进来。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征服美洲、非洲及印度等大片地区之后，又把矛头指向中国。为了改变中英贸易中对其不利的入超地位，他们进行大量的毒品走私活动，把强迫印度农民种植的鸦片烟，集中收购，漂洋过海，向中国倾销。而当他们的这种罪恶活动遭到遏制时，便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即鸦片战争。在外国侵略者面前，清朝军队不堪一击，终与侵略者订立城下之盟，使中国丧失主权，丧失独立，被迫走上殖民化的道路。大量的战争赔款，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经过十年酝酿与准备，逐步形成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全国各地各族人民大起义。

鸦片战争的失败，不仅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也暴露了中华民族的弱点，使中国人民在痛苦中惊醒。他们憎恨殖民主义者的强暴蛮横，憎恨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卖国求安，同时也感到侵略者确有可恃之术，中国确有落后之处。而要战胜敌人，必须首先学习敌人之长，克服自身之短。这一认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代先进人物思想认识的主流。只是由于阶级、地位以及出身、经历的不同，产生了认识上的差异和自身利害的冲突，并各自提出不同的救国方案，围绕着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尤其资本主义侵略者同中华民族这一更为主要的矛盾，展开了时急时缓、错综复杂的分合争斗。太平天国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阶级提出的救国方案。

太平天国革命的主要领导人是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萧朝贵等人。他们先是创立了一个民间团体，劝人行善、拜上帝，史称“拜上帝会”或

① 《石渠余纪》第1卷，第1页。

② 《石渠余纪》第1卷，第2页。

③ 昭梿：《啸亭杂录》上海扫叶山房光绪二十七年石印本，第6卷，第11页。

“拜上帝教”。信从者多贫苦农民。当政治形势变得越来越有利于革命发动的时候，洪秀全、冯云山便向杨、萧等人透露了夺取天下、另建新朝的重大图谋。于是，他们衷心拥戴洪秀全为一国之主，大家齐心协力，积极准备，并于道光三十年冬（公元1851年），在广西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

他们定国号为太平天国，洪秀全称天王。意思是要把基督教原有教义中的天堂，从天上搬到人间，由死后提到生前，并将之称为“小天堂”，而将原有教义中的天堂称为“大天堂”。宣布大天堂归上帝所有，是永恒的，而小天堂则要在天父、天兄、天王的领导下，经过众兄弟姐妹的一番奋斗，方可在人间建立起来。还宣布，只有在建立小天堂的过程中建立功勋，死后才能荣升上帝的大天堂，永享富贵。而他们在斗争中所遇到的一切艰难困苦，都是上帝对他们的考验，对他们的玉成、磨炼。其后，他们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广大贫苦农民的要求，不断发展其教义，直到制定并公布《天朝田亩制度》这一纲领性的文件，为他们的小天堂描绘出一幅生动具体的蓝图。虽然带有乌托邦性质，但在当时却对太平天国广大将士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太平天国鼎盛之时，曾占有江西、安徽、湖北的大部和江苏的一部分，清军江南、江北大营一再被毁，湘军大帅曾国藩困于江西一隅之地，二号人物胡林翼一度产生自杀之心。不料，杨秀清居功自傲，野心膨胀，假代天父传言之权，逼洪秀全封其为“万岁”。其实，杨秀清以东王节制诸王，执掌太平天国军政大权，军民上下无不畏惧，所奏之事无不允准，一切号令皆由他发出，实权已超过洪秀全。天王洪秀全久处虚尊之位，只是多一个“万岁”的称号，与尊称“九千岁”的杨秀清在称号上仅有“千岁”之差。如今杨秀清要消除这一差别，造成形式上二人平起平坐，实际上则由他独掌大权的政治格局，这就不能不使洪秀全心生疑惧。在此之前，杨秀清已与韦、石、秦等关系紧张，他们积忿于杨的跋扈，已有人密议除杨之策，仅由于洪的反对而未敢动手。而正当此千钧一发之际，洪秀全突然接到杨秀清的心腹爱将、天官正丞相陈承谔的紧急密报，称杨欲杀洪自为，发兵攻打天王府。洪秀全遂决心杀杨，一场决定太平天国命运的大悲剧随之发生。

这场内讧从咸丰六年韦昌辉杀杨开始，到咸丰八年石达开离京出走为止，前后历时三年，终致精兵猛将所余无几，太平天国由盛转衰，一步步走向失败。此后，太平天国能够坚持八年之久，原因虽然不止一宗，但主要还是由于当时南方革命形势仍在继续高涨，而清政府的政策也还没有调整到位，湘军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而清朝原有的旗、绿各营武装力量，即使到了太平天国后期，也不是太平军的对手。

这场大革命历时十四年，波及十八省，拥兵百万，定都天京，建立太平天国农民政权，与设在北京的清朝政府南北对峙，长达十一年之久，并公布了自己的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与《资政新篇》，从而将单纯农民战争推向高潮。这在中国和世界史上都是仅见的。它虽然最后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下遭到了失败，但其伟大的历史作用与深远意义是不能抹杀的。

它向清政府为代表的封建反动卖国势力和外国侵略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它从未承认过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签定的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提出了彻底否定封建剥削制度的平分土地的方案，从而指出了中国人民近代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方向，揭开了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它沉重地打击了反动腐朽的清王朝，基本上摧毁了作为其军事支柱的八旗、绿营武装，使满洲贵族失去了控制国家武装力量的实际能力，国家军政实权渐渐落到汉族地主官僚手中，从而为辛亥革命最后推翻清王朝与封建君主专制体制提供了有利条件。

这场革命的伟大意义不只这些，近年人们也对它提出不少问题，但本书不打算对这些问题展开广泛的讨论，仅拟集中探讨这场失败了革命，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具体而言，就是这场革命与曾国藩集团的崛起有什么内在联系，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实际进程是否起了推动作用。

满洲贵族自入关以来，对汉族官员防范甚严，尤其不让他们掌握军事实权。而太平军对八旗、绿营武装的摧毁性打击，使满洲贵族陷于两难之间的选择：或者严密文法，自取灭亡；或者听任，甚至支持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汉族官员壮大武装力量，扩张地方实权，以依靠他们将这场革命镇压下去，保住自己的皇位。两害相权取其轻。满洲贵族经过长期的犹豫摇摆和反反复复的内部斗争，直至一场腥风血雨的宫廷政变，终于断然放弃前议，采取后策。倘若没有太平天国革命，以及由此导致的清政府一系列自身变化与政治策略的调整，曾国藩集团不仅难以发展壮大，恐怕连其自身生存也大成问题。遗憾的是，对于近代史上这种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至今没有引起史学界足够的重视，虽有不少著作涉及这一问题，提出不少颇具学术意义的见解，但还没有集中、系统地将这一带有规律性的认识揭示出来。而有些人，只是挖空心思想着如何彻底否定太平天国，借以为曾国藩彻底翻案，以便把这一早被历史所抛弃的政治僵尸，重新树为“古今第一完人”。他们当然也就不会去想：如果没有太平天国革命，曾、胡、左、李怎么会成为近代史上的政治名人？那时的曾国藩，最多不过是个文官与学者。胡、李或者有官可做。而左宗棠则很可能老死民间，默默无闻。不

过，无论他们学问多么大，文章写得怎么好，都不会引起这么多文人学士经久不衰地崇拜。仅就学问、文章而言，即有清一代就有多少人超过曾国藩，而他们当中又有谁值得当今学人如此动心？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曾国藩是一位政治人物。试问，数十年来，又有哪一个成为学术热点的问题，与政治无关？而所有这一切，则都是这场革命造成的，追本溯源还是太平天国。言及于此，则太平天国的作用与影响自不待言，研究这一历史辩证关系的必要亦自不待言。

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全国大起义对清王朝的打击是极其沉重的。太平军从广西一路打到南京，北伐京津，西征湘鄂，东取苏杭，三次攻占湖北省会武昌，两次攻占安徽省城安庆、庐州，因战争失败而被免、被革乃至丧失性命的钦差大臣、总督、巡抚及都统将军先后达三十多人。咸丰元年广西巡抚周天爵革职。咸丰二年钦差大臣赛尚阿、徐广缙、陆建瀛先后革职逮问。赛尚阿先判死刑，后改流放；陆建瀛旋因城破被杀。同年，广西巡抚邹鸣鹤革职，湖北巡抚常大淳城破被杀。咸丰三年钦差大臣祥厚城破被杀，讷尔经额革职。安徽巡抚蒋文庆城破被杀，继任李嘉端革职，江忠源城破自杀。咸丰四年湖广总督吴文镕兵败被杀，继任台涌革职。湖北巡抚崇纶革职，继任青麇因兵败逃走被按律处死。咸丰五年钦差大臣西凌阿革职，胜保革职逮问。湖广总督杨需革职，鄂抚陶恩培城破被杀。咸丰六年钦差大臣托明阿革职，向荣败死，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兵败被杀。咸丰九年钦差大臣德兴阿兵败革职。咸丰十年钦差大臣张玉良革职，和春败死，督办宁国军务周天受城破被杀，督办徽州军务张芾免职。两江总督何桂清先因失城革职拿问，继以弃城逃走、枪打阻行缙绅于同治元年按律处死。浙江巡抚罗遵殿、江苏巡抚徐有壬则皆因城破被杀。咸丰十一年杭州将军瑞昌城破被杀，浙江巡抚王有龄城破自尽。同治三年钦差大臣、西安将军多隆阿在陕西周至重伤致死。同治四年钦差大臣、蒙古博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在山东菏泽兵败被杀。至于巡抚以下藩、臬、提、镇及道、府、州、县官员被杀、被革者，则不计其数，无从统计。

有些几经反复、拉锯争夺的省份，例如，安徽省，曾长期被清朝官员视为畏途，上至巡抚，下至知县，都不愿到这里做官，已经上任的官员，也千方百计地设法调走。两江总督曾国藩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安徽糜烂之区，人人裹足远避。前此七八年间，福中丞告病告假奏疏近十次，其避抚篆如避虎狼。近翁中丞思卸抚篆，前后亦具疏数次。恩廉访不肯接篆，曾经严旨申斥。”^①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还说：“安徽用兵十年，蹂躏不堪，人

^①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书札》，湖南传忠书局版，第13卷，第27-28页。

人思为畏途。通省实缺人员，仅有知府二人，州县二人。即候补者亦属寥寥。每出一缺，遴委乏员。”^①

太平天国对清廷的致命一击，是对其主要武装力量的摧毁与对其主要财源的破坏。清王朝的主要武装力量是八旗骁骑营与绿营，即通常所说的八旗兵与绿营兵。八旗骁骑营简称旗营，约二十多万人，主要戍卫京师，少数分防各地，由设置各城的将军、都统、副都统统辖。绿营兵约六十多万人，少数驻扎京师，绝大多数分派全国各地，按营、汛驻扎。咸丰三年当太平天国北伐军威胁清朝的统治中心北京的时候，清政府调兵遣将，直到咸丰五年才把北伐军彻底打败，其所使用的主要兵力是蒙古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统率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八旗兵在天津与京东张家湾等地受到沉重打击，基本上失去战斗力。陆续从黑龙江、内蒙古调来的骑兵马队，又于同治四年在山东被捻军歼灭。从此，清政府再也难以组成大支八旗武装力量。至于驻防各地的八旗兵，在太平军的进攻面前，则连自己的满营都守不住，江宁将军祥厚与杭州将军瑞昌都因此送掉性命，更不可能成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所以，在长期的战争中，清政府对太平军作战，主要靠绿营与勇营。自金田起义以来，清政府就从各地调兵进行围追堵截。起初，尚有乌兰泰等少数八旗兵将，曾与绿营将领向荣屡生龃龉。自乌兰泰死后，则主要使用绿营兵对太平军作战。他们在受到太平军的几次打击之后，逐渐变得乖巧起来，不再敢贸然出击，只远远地进行监视、围困或在后尾追。故咸丰二年在长沙城内外同太平军作战的清军，计有一大学士、两总督、三巡抚、三提督、十一二员总兵，统带兵勇六七万人，仍让人数不足六万的太平军悄悄撤走，迅速北上，连下岳州、武昌、九江、安庆，直取江宁，改名天京，定为首都。所以，曾国藩在总结几年来的作战情况时说：“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时日不为不久，糜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未闻有与之与鏖战一场者；往往从后尾追，未闻有与之拦头一战者。”^②而清军则依然故我，既不攻城，也不撤走，而分别在长江南岸的孝陵卫与江北扬州设立两座大营，号称江南大营与江北大营，眼看着各地练勇与太平军厮杀，自己却妄图重温镇压白莲教起义时那种困练苦战、绿营收功的旧梦。而太平军亦对其置之不理，派出自己的主力部队进行北伐与西征，只留下一部分部队戍卫京畿，一旦时机成熟，即于咸丰六年调集大军一举踏平清军江北大营与江南大营。不久，清政府调兵遣将，又把江南大营与江北大营恢复起

^①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18卷，第42页。

^② 《曾文正公奏稿》，第1卷，第56页。

来。咸丰八年太平军再破江北大营，咸丰十年再破江南大营，全歼其所属部队，并顺势夺取苏、常富庶之区，使清政府再也无力调集大支清军，重建江南大营与江北大营。苏南地区是清政府的主要财源，清军江南与江北大营的军饷，一向由苏南和浙江供应。这样，苏南地区的丢失与江南大营的败溃，就使清政府陷于兵饷两空的困难境地，唯靠各省督抚自筹兵饷同太平军作战。迨至同治三、四两年多隆阿、僧格林沁相继毙命之后，忠于满洲贵族的兵将基本丧失，无论平时战时，清政府要想维持自己的统治，除了依靠湘、淮勇营之外，也就再无其他选择了。

第二节 中央政权权力结构的变化与归复：相权的让出与收回

太平天国革命对清政府的制约和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不仅迫使其在政策上做出大幅度调整，而且造成其自身权力结构的很大变化，从中央到地方，都进行了一次权力再分配。多年来，对于地方督抚军政实权的增强，曾有不少人论及，而对于中央政权权力结构的变化，出于种种原因，则较少有人注意。而若不弄清中央政权的变化，则很难弄清其对汉员督抚将帅的政策得以及时调整的关键所在和地方政权变化如此之大的内在原因。所以，本书的考察首先从中央政权开始。

中国自古以来，历代专制政府的权力大约一分为三，即君权、相权、将权，分别由君主、丞相、将军执掌。君主掌决策、用人之权，而具体行政、用兵则由丞相、将军执行。丞相为政府（一般为内阁）首脑，将军为军队的统帅，平时主要靠相，战时主要靠将，分去君主的很大一部分权力，即是其不可或缺的助手，也对其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丞相主持内阁，执掌六部，遇有国家大事，即由君主作出决定，具体由丞相按规章制度办理。故有所谓“掌天下之平”之说，君主亦不得肆行己意。汉唐盛世曾有过不少这样的故事。遇有战事则君主命将授符，将军率兵出征，而一旦兵权在握，即有机动专断之权，不受君权的遥制。亦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从奴隶制到封建制，这种国家中央政权的权力分配制度行之多年，对社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其中相权的存在则尤为重要，往往影响或决定一代王朝的兴衰。因为君主之位按血统继承，实行嫡长制，往往由自然而决定，并非出于人的选择。因而，承位之人并不一定有治国之才。而丞相则由君主任命，是可以选择的，往往由治国之才担任，既是国家方针大计的制定者，又是具体执行者。所以，丞相任用的人，即可使一个国家或地区兴旺发达。例如，历史上著名的东周春秋时期的管仲治齐，汉之文景之治，唐之贞观之治、开元之治，皆多借重于丞相之力。而历史上的所谓名

臣贤相，从傅说、姜尚、管仲、商鞅到萧何、魏征、姚崇、宋景、王安石，其名望与历史作用，则较之同时代的帝王，有似并无逊色。

迨至封建社会后期，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明洪武十三（1380）年太祖皇帝朱元璋杀左丞相胡唯庸之次日，即发布文告，声称“朕欲革去中书省，升六部，仿古六卿之制，俾之……权不专于一司，事不留于壅蔽。”^①中书省即内阁，也是当时的政府。作为皇帝的朱元璋撤销中书省，直接掌管六部，也就是撤销了丞相之权，或者说兼并了丞相之权，身兼君、相二职。从此而后，君主不仅是国家元首，同时还是政府首脑，君主专制进一步加强，相权也就不复存在了。

清承明制，虽有内阁之名而无内阁之实。尽管顺、康之时大学士尚有阅折、拟稿之权，但既不能掌管六部，亦即不是政府，也就不再是原来的内阁，只不过徒有虚名而已。及至雍正八年设立军机处之后，内阁仅有的这点权力亦被彻底剥夺，内阁学士、大学士完全成为荣誉职务。军机处虽具有一定职权，协助皇帝处理国家大事，但并无专职人员，皆由大学士与部院大臣兼任，带有临时差派的性质，与明代以前的内阁不同。领班军机大臣亦非政府首脑，并不执掌六部，亦不同于明代以前的丞相。所以，出于某种习惯，军机处有时被人称为政府，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被称为丞相，而实际上却无相权可言，亦属于一种荣誉称呼。

在太平天国革命期间，出于政治上的实际需要，清政府的这种权力结构暗中发生了变化。虽然，名义上并未设立丞相一职，但实际上，皇帝却不得不将往日被他兼并的相权分离出来，交给一人执掌，使之成为有实无名的政府首脑，以提高办事效率，迅速而恰当地处理决定国家命运的军政大事。在此期间，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而所采取的重大政治对策，也就不能不与当时握有相权的人息息相关。

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之初，咸丰帝奕訢仍循旧例，主要依靠军机大臣协助自己处理日益繁剧的军政要务。不料，事过境迁，时势有异，昔日得心应手的办法失去灵验，事事处处不遂人意。

有清一代，自雍正八年军机处设立以来，一般来说，军机大臣是最有权势、最受信任的。但论及个人的实际权势，却并非人人均等，而是因人而异。当军机大臣奏事之际，依次跪在皇帝面前，领班军机大臣离皇帝最近，皇帝讲什么话听得真切，提什么问题亦应首先回答。其余军机大臣，尤其最末一位，所谓“卷帘军机”或“学习行走”的军机大臣，皇帝讲什么话，根本听不清，对他所提出的问题，除指名要其回答外，亦不能越次

^① 《明实录》，江苏国学图书馆传抄本，第129卷，第4页。

抢答。故有人曾用四乘小轿的轿夫，各自不同的神态、感受来戏喻他们的境遇，有所谓“扬眉吐气”、“昏天黑地”乃至“吃人臭屁”之说。所以，军机处中只有领班军机大臣握有较大的实权，其余军机大臣都不能与他相比。至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军机处内部的排列次序和主次关系外，也同当时实际存在的满汉隔离、民族歧视有关。

清王朝是满洲贵族建立的一代政权，军机大臣虽名义上满汉兼用，实际上主要权力则掌握在满员手中。领班军机大臣一般由满员担任，遇事专断，汉员不敢与之相争。若有倔犟不服、争辩不已者，亦必以失败而告终。道光时就有军机大臣王鼎为重新起用林则徐一事，同领班军机大臣穆彰阿屡争不胜、愤而自杀的例子，则是对这种不平等关系的最深刻地揭露。再者，在那满洲贵族主宰一切的政权中，这些汉员军机大臣所以能够升至如此高位，主要并非由于他们真的有什么治国治军的出色才能，而多因他们唯唯诺诺，老于世故，遇事模棱，善观风色。而皇帝平时也不需要他们有什么本领，有什么主见，而恰恰相反，需要的正是他们没有才能，没有定见，只要服服贴贴就行了。据说，军机大臣曹振鏞“性模棱，终身无所启沃，入对但颂而已”，故能在嘉、道两朝“特见委任”，“当国”^①十五六年。而其“晚年恩遇盖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门生后辈有入御史者，见必诫之曰：‘毋多言，毋豪意兴。’”有人说：“道光以来，世风柔靡，实本于此。近更加以浮滑，稍质直，即不容矣。”还有人赋一剪梅四首以讥讽这种官场风气。其一云：“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其二云：“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其三云：“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其四云：“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阴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②这样，一旦国家有事，到了生死存亡之秋，面对决定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需要他们出谋划策、承担责任的时候，也就无能为力了。故多年之后还有人对此切齿痛恨，直斥“曹振鏞之误清”。认为曹振鏞“拘牵文义，挑剔细故，钳制天下人心，不得发舒，造成一个不痛不痒之天下。洪杨猝发，几至亡国，则曹振鏞之罪也。”^③其实，始作俑者还是清朝皇帝，曹振鏞之类汉大臣，不过投其所好而已。

①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学生书局影印本，同治元年五月廿八日。

② 朱克敬：《瞑庵二识》，上海进步书局石印本，第2卷，第5页；第4卷，第6页。

③ 小横香室主人编：《清朝野史大观》，中华书局民国四年十二月版，第7卷，第96页。

道光三十年十月，登极不久的咸丰皇帝将长期把持枢垣的穆彰阿革职之后，领班军机大臣曾几度易人，其中，除咸丰五六年间在位不及两年的文庆外，在如何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问题上，皆没有多大作为。而赛尚阿还因政治上与军事上的无能而获罪，几乎被咸丰杀掉。自咸丰六年十一月文庆去世至咸丰十年六月，近三年半的时间内，这一要职即由以次递升的彭蕴章担任，终使咸丰皇帝在最需要他为自己出力卖命的时候，陷入用非其人的苦恼。可以说，历史让他喝下了清王朝多年酿就的苦酒。

彭蕴章江苏长洲人，出身书香门第、高官富豪之家。其高祖父彭定求为康熙十五年状元；曾祖父彭启丰为雍正五年状元，官至侍郎。本人在官场中混迹甚久，受那种不黑不白、无是无非的习气熏染甚深。早在道光十五年考取进士之前，彭蕴章即由举人捐官内阁中书，充任军机章京。考取进士后授工部主事，仍留值军机处，充任章京。此后累次迁官，位至卿贰，咸丰元年以工部侍郎充任军机大臣。咸丰六年十一月原领班军机大臣文庆去世，彭蕴章以文渊阁大学士、工部尚书，顺序递升为领班军机大臣。在其担任军机大臣的十年间，尤其位至领班军机大臣的四五年间，清政府真是到了内外交困的地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全国人民大起义方兴未艾，战意方酣，直欲取清王朝而代之；而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则气势汹汹地打了进来，蓄意侵夺中国的主权，逼迫清政府低头，从广州一直打到北京，不达目的，绝不停止进攻。面对如此危局，清政府有多少大事急需处理，而有不少问题处理当与不当，则又关乎着清朝的存亡。咸丰帝面对一个个令人头疼的难题，捉襟见肘，狼狈不堪。这时他才痛切感到得力助手的重要。无奈彭“蕴章在枢府日，唯阿取容，从无建白，外间戏以彭葫芦称之”，^①根本不可能担当此任。薛福成《书宰相有学无识》一文所讽刺的两位宰相，就是祁寯藻与彭蕴章。不过，当时皇帝身边，除军机大臣外，还有一种少为人知的御前大臣。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清代官制上的一大发明。清王朝“鉴明弊政，不许寺人干政”，“内廷事务，特设御前大臣，皆以内廷勋戚诸臣充之，无定员，凡乾清门内之侍卫、司员，命其统辖。每上出宫巡幸，皆橐鞬扈从，代宣王言。名位尤重，仿两汉大将军制，而亲谊过之。初尚命军机大臣代摄”，“后特分析，体制尤正”^②，但从此不再办理政务。如今形势严峻，亟须代谋之人，咸丰帝遂将其两种职能合并起来，由御前大臣“代摄”军机大臣之责。也就是说，咸丰帝失望之余，不得不改弦更张，将军机大臣弃置一旁，任用满族亲贵，

^① 章士钊：《热河密札疏证补》，《文史》第2辑，第94页。

^② 《啸亭杂录》，第1卷，第4页。